

# 北宋上层士大夫的都市生活空间与其歌词书写

## ——以晏殊为个案

李真雅\*

### 目 录

1. 绪论
2. 都市中的禁地：上流阶层的寿宴
3. 远离都市公共空间
  - 1) “小阁重帘有燕过”——高雅士大夫的富贵
  - 2) “东风昨夜回梁苑”——文人士大夫的雅宴
4. 富贵宰相的都市眷恋与闲愁
5. 结语

### 中文摘要

词与都市总要通过词人这个媒介才能相联互动，词人就是词创作的主体，也就是都市空间的主体。都市作为词人的生活空间，影响到其生活内容及生活感受，参与个体的人格建构和观念形成，并转化为作品空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词人即使同样生活在作为整体的都市，其社会文化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决定其生活空间，不同身份地位的词人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活空间。词人基于自己的空间经验来书写都市，于是他们的都市写作就有了表现不同都市空间内涵的意义。本文摆脱既存词与都市关系研究对“市井”、“市民”因素的偏向，关注士大夫阶层的都市生活空间和文化，以晏殊为个案，审视上层士大夫词人在怎样的都市空间中如何生活、如何感受，从中创作出什么样的歌词，以期对词和都市的关系获得更为立体的认识。

**关键词：**北宋都市，都市空间，都市词，北宋词，士大夫词，北宋词人，晏殊

---

\*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 1. 绪论

词起源之时，其中已颇有以都市为背景者，如杨海明所归纳的：“民间词的‘产地’有农村，有边塞，但是似乎已有向城市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城市集中的趋向。”<sup>1)</sup> 而词这一文体被文人接收并采用之后，都市更加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背景，及至宋代，随着都市的繁荣，词与都市的结合愈加紧密，内涵也更为丰富。

已有不少研究关注词与都市的这种密切关系，其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趋势：其一，既往研究多以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对待词，注重于发掘词中所描述的物质性都市景观或客观性都市风俗。<sup>2)</sup> 其二，以往关于词与都市关系的谈论总聚焦于柳永词研究：其原因首先是与上述研究倾向有关，由于柳永词中针对都市景观或风俗的描写较多<sup>3)</sup>，符合社会文化学角度的研究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柳永词最为明显体现“市民”、“市井”等的都市因素。<sup>4)</sup> 学界往往以西方的发展

1) 杨海明：《唐宋词史》，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2) 相关议论参见拙稿《北宋下层文人的都市生活空间与其歌词书写——以柳永为个案》，《中国语文论译丛刊》48辑，2021年，第28-29页。

3) 对于所谓“都市词”的认识，早期柳永词研究中可以找到其苗头。梁丽芳《柳永及其词之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对“都市风物词”的具体论述参见该书第54-57页。），在题材上将柳永词分为三大类，认为“艳情词”和“离别、羁旅词”之外，还有一类数目较少，而又自成一格的“都市风物词”。文中虽然没有全部列举属于此类的作品，但是从其论述可知，“都市风物词”所指的是针对都市繁华景物描写的词。宇野直人《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张海鸥、羊昭红译，上海：《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和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据其统计，《乐章集》中描写都会承平、人民生活概况的作品约27首，占十分之一左右，具体内容参见该书第18-37页。）都详细分析了柳永每篇词作的思想题材，亦提到其所运用的都市题材。自后，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陈登平《柳永都市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专门研究柳永都市词的论文逐渐出现。

4) 事实上，这些侧面也是说明北宋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学者曾注意柳永词的市民文学特征：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六章从表情方式、结构艺术、音乐源泉和语言风神四个方面具体论述柳永词具有的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学形式美；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阐述柳永词与新兴市民

史观去看宋代都市，强调宋代都市的近代性面貌，偏重于“市井”、“市民”等蕴涵商业性、世俗性的侧面，这种倾向在词与都市关系研究中同样存在。及至北宋都市，这些侧面所占的比重固然增大了<sup>5)</sup>，但不能涵盖北宋都市的一切。北宋都市所含的内容显然更大于“市井”、“市民”，北宋都市对词的影响因素也应不止于此。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云：“在帝制后期中国城市社会，市井俗文化虽然以其之新颖别致，之吸引眼球，别开生面，构建起城市文化新格局，归根到底，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sup>6)</sup>作为官僚阶层的一员，士大夫占据着北宋都市文化的领导地位，他们也是词创作的主力，士大夫阶层在都市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感情、文化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本文希望跳出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限制以及对“市民”、“通俗”、“商业”等都市因素的偏重，更多注重士大夫词人的都市生活及其对生活文化的感受，并关注其都市观以及在都市中产生的感情、审美和自我认识等如何在词中得到展示和表现等问题，由此考察词与都市的关系。为此，本文以晏殊为个案探讨上述问题。晏殊是早年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在政治地位、文化身份等的方面上具有明显的特征，与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都市（汴京）的柳永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代表上层士大夫阶层的都市空间和文化。

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的领袖，也是显达的士大夫，他长期处于政坛的中心，自然与以汴京为主的富饶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能改斋漫录》所载的：“晏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sup>7)</sup>他实为未尝远

思潮的关系；宇野直人《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张海鸥、羊昭红译，上海：《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六章通过其描写女性之作和以夜晚为舞台之作，谈论当时都市繁华的街市状况和市民生活、情感等因素对柳永词风的影响。

5) 唐宋之际发生了许多变革，所谓的“城市革命”也在其中，进入北宋而达到峰顶，都市摆脱了传统封闭式结构，其面貌焕然一新，这意味着北宋都市的内涵比前代丰富多彩。关于“城市革命”参见[美]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6)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页。

7) [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5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4册，第194页。

离京畿的“都市士大夫”<sup>8)</sup>。北宋初期，天下太平，以首都汴京为首的大都市可谓一片繁华盛景，兼之其人本身的生活尤为丰足美满，因此他的《珠玉词》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富贵繁荣的都市生活景象。而与同一时期柳永等人所描写的都市空间相比，晏殊词所描述的都市空间特有其殊异之处，这都与他的生平经历有密切的关系。<sup>9)</sup>

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卒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经历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宰相。虽然晚年有少许风波，而总体上其仕途通显得意，借用杨海明的话说：“在宋代的文人中间，他是一位难得的幸运儿——一生基本风平浪静、一帆风顺。”<sup>10)</sup>他是抚州临川人，父亲晏固是抚州府的一位狱吏，其家世不显，而晏殊自幼颖异，“七岁，知学问，为文章，乡里号为神童。故丞相张文节公安抚江西，得公以闻。真宗召见，既赐出身。”<sup>11)</sup>此时为景德元年(1004)，十四岁的晏殊被推荐给朝廷，由此从田里到汴京，跻身官场。他即受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后来历任集贤校理，太常寺丞，直史馆。天禧二年(1018)二十八岁以户部员外郎充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仁宗即位后，晏殊因历太子舍人而受到宠幸，陆续升官晋爵。天圣五年(1025)三十五岁为枢密副使，三十八岁为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天圣九年(1031)四十一岁为三司使，次年为参知政事。康定元年(1040)五十岁加检校太尉枢密使，庆历二年(1042)五十二岁自枢密使加同平章事，五十三岁自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将富贵与声名集于一身。

由此可知，晏殊经历上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小小年纪就走上仕途，得到重用而身居高位<sup>12)</sup>，这就是决定他的都市生活半径，并形成其都市观的主要背

8) 与都市结成密切的关系，或有志走向都市的士大夫，被[日]伊原弘等有些学者称为“都市士大夫”。参看[韩]梁钟国：《宋代士大夫社会研究》，首尔：三知院，1996年版，第138页。

9) 晏殊的生平系年大致依据夏承焘：《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0) 杨海明：《唐宋词史》，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11) [宋]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册，第351页。

景。宋代一般读书人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以行动相对自由的士人身份涉足于繁华的都市，出入都市公共空间，一时溺于世俗娱乐文化，往往表现出其放荡不羁之情，而晏殊未经这种中间阶段。价值观尚未完全树立的十四岁少年，进入严肃的朝廷，青春时期一直在馆阁度过，被官场的行为规范约束，结果他为正统官僚士大夫的模子所塑造，正如真宗对他的评价：“加以沉谨，造次不逾矩，甚为搢绅所器。”<sup>13)</sup> 从下面《梦溪笔谈》的记载可以窥见晏殊青年时期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仕途生活，并由此导致的都市生活领域之限界：

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宴，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宴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sup>14)</sup>

这段记录说明晏殊由馆职晋升为东宫官的背景<sup>15)</sup>，据夏承焘《二晏年谱》，天禧二年（1018）二月，他为升王府记室参军，再迁左正言，擢史馆，同

- 12) 考虑到宋代登科进士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六七岁，由童子科入朝作官的晏殊，其入仕年龄颇少。宋代童子科不是常举，如太宗时童子科及第者仅有2人，真宗时为11人，仁宗时为10人，而且由童子科入仕而登上高级职位的人并不多，像晏殊这样的情况相当罕见。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49页；朱红梅：《唐宋童子科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9-10，25页。
- 13) [宋]李焘撰：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册，第1959页。
- 14)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80页。
- 15) 馆职为三馆秘阁官的通称。北宋前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总名崇文院。三馆秘阁官有：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集贤院学士、直学士、史馆修撰、集贤殿修撰、判馆、判阁、直馆、直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史馆编修、史馆检讨、崇文院检讨、秘阁校勘等。参看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页，第145页。

年八月以户部员外郎充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sup>16)</sup> 由此可推知，这是天禧二年晏殊直史馆的约六个月之事。当时正值升平，汴京繁花似锦，士大夫的世俗享乐生活颇为盛行，往往至市井酒楼举办宴会，但他以贫为由而不出去。北宋前期官俸较低<sup>17)</sup>，汴京的物价颇高，接受俸禄，所剩无几，这一时期晏殊不富应是属实。但馆职的俸禄与其它官署同品阶的职官相比高一些，馆职人员除了正俸外，还有增给钱、贴职钱和各种实物津贴<sup>18)</sup>，考虑到其他“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繼夕”的情况，估计晏殊的家境亦不至于贫甚而不可宴游，实际上如《迎春乐》（长安紫陌春归早）、《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等的少数词作说明他直史馆时偶尔出游。<sup>19)</sup> 晏殊不经常至“市楼酒肆”宴饮的理由应该不止于贫穷，更与其性情和志趣有关。他飞黄腾达而居积致富之后也不前往市井酒楼，对都市的公共娱乐空间一直采取慎重保守的态度。晏殊是正如记载所说的“非不乐宴游者”，但他的宴乐活动在另一个都市空间中，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其词主要描写的就是这种有别于市井行乐的情景。

## 2. 都市中的禁地：上流阶层的寿宴

晏殊在汴京享受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宫廷官府、贵族宅院等只有具备身份资格的人才能进出的地方，他书写的都市明显反映着这种空间的特性。晏殊词中常见的空间背景是相对封闭的或是部分组织的都市空间，难以找到如柳永词所描写的市井小巷、酒楼茶肆、平康诸坊等市民随便来往的都市公共空间。这种特性显然是缘于晏殊的社会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领域。

晏殊身为得宠的文臣、文坛领袖，每逢喜庆，写应制之作，此类词作均反

16)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3-194页。

17)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18) 姚行地：《关于宋代“馆职”》，《图书情报工作》，1988年，第6期，第42页。

19)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12页。

映着他在此空间中的活动经历。下面的《喜迁莺》两首均写朝廷盛宴的场面：

风转蕙，露催莲。莺语尚绵蛮。尧莫随月欲团圆。真驭降荷兰。  
褰油幕。调清乐。四海一家同乐。千官心在玉炉香。圣寿祝天长。<sup>20)</sup>

歌敛黛，舞萦风。迟日象筵中。分行珠翠簇繁红。云髻袅珑璁。  
金炉暖。龙香远。共祝尧龄万万。曲终休解画罗衣。留伴彩云飞。

这两首词是祝寿词，其祝颂对象为宋仁宗<sup>21)</sup>。前一首，“真驭降荷兰”、“褰油幕”等句说明寿宴设在御花园中，晏殊勾画出温煦明丽的初春景致，其言应时应景，气象富丽，作为奉献皇帝的应酬之作十分得体。后一首，注重描绘筵席上歌舞之态，以穿插“象筵”、“金炉”、“龙香”等殿阁风景，写出有别于士民间的宴会。赵尊岳所评的：“盖殿阁酺宴，非可出以寻常行乐之语，然未结犹用宕笔，清而不褻，是诚工于状物，且识体制之尊者。”<sup>22)</sup>可知晏殊熟悉宫廷宴会，并深识宫中体制。

除了宫廷、御苑等皇帝的空间之外，晏殊词中可见皇室宗族及世家大族的空间。例如，《长生乐》（阆苑神仙平地见）：“阆苑神仙平地见，碧海架蓬瀛。洞门相向，倚金铺微明。处处天花撩乱，飘散歌声。装真筵寿，赐与流霞满瑶觥。红鸾翠节，紫凤银笙。玉女双来近彩云。随步朝夕拜三清。为传王母金籙，祝千岁长生。”晏殊以“阆苑”、“洞门”、“金铺”、“瑶觥”、“红鸾翠节”、“紫凤银笙”等富丽的辞藻来描写出祝寿豪宴的场景，张草纫加疏说：“从词语的隆重和场面的宏伟看，寿主是皇族中一位地位极高的王公。从史实推测，此人很可能是仁宗帝的叔父荆王元俨。”<sup>23)</sup>又《诉衷情》（喧天丝竹韵融融）：

20)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所引的晏殊词俱据此本，下文不再赘注。

21)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22) 赵尊岳：《珠玉词选评》，《词学》第七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23)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喧天丝竹韵融融，歌唱画堂中。玲女世间希有，烛影夜摇红。  
一同笑，饮千钟。兴何穷。功成名遂，富足年康，祝寿如松。

通过“喧天”的乐声、“世间希有”的妓女等夸张的表现来突出“画堂”宴席之盛大、寿主身份之高贵，刘扬忠认为此人可能是与晏殊地位相近的官僚。<sup>24)</sup> 由此可见，晏殊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与身份地位尊贵的人士结成交游，参与他们举行的宴会，写出其豪华生活的一面。

上面所列的词作都属于祝寿词，晏殊就是词史上首次大量创作祝寿词的词人。按刘尊明统计，《全宋词》中的寿词达约431人的凡2554首，其中北宋寿词仅占180首左右，作者约32人<sup>25)</sup>，在现存的晏殊词138首中，祝寿词共有25首左右，由此可知其所占的比重颇大。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宫廷祝寿仪礼可谓异常繁盛<sup>26)</sup>，这种宫中风气从上到下扩散，熟悉宫廷文化的高级官僚阶层可能优先吸收这种风气。在繁荣的都市环境里，达官贵人借助他们的权势和财力，能够大开佳人歌舞、酒香四溢的华丽筵宴。

晏殊本人也往往在其私第里设置寿宴，如《菩萨蛮》（人人尽道黄葵淡）：“摘承金盏酒。劝我千长寿。”《少年游》（谢家庭槛晓无尘）：“榴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春。岁岁年年，共欢同乐，嘉庆与时新。”《木兰花》（杏梁归燕双回首）：“画堂元是降生辰，玉盏更斟长命酒。”《拂霓裳》（庆生辰）：“庆生辰。庆生辰是百千春。开雅宴，画堂高会有诸亲。”这些词作都记录着其家庭寿宴的场面。试看《少年游》（芙蓉花发去年枝）：

芙蓉花发去年枝。双燕欲归飞。兰堂风软，金炉香暖，新曲动帘帷。  
家人拜上千春寿，深意满琼卮。绿鬓朱颜，道家装束，长似少年时。

这首词也写家人生日宴会的场景，迎来生日的主人公是晏殊的夫人王氏。<sup>27)</sup> 先以“兰堂”周边的风景开篇，时期正逢秋天，木芙蓉花绽放芬芳，燕子

24) 刘扬忠编著：《晏殊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196页。

25) 刘尊明：《宋代的祝寿风气与寿词创作》，《文史知识》，1998年03期，第86页。

26) 刘尊明：《宋代的祝寿风气与寿词创作》，《文史知识》，1998年03期，第86页。



准备归南越冬，这两句凸显空间环境的幽美闲雅，接着的三句形容“兰堂”中炉香温暖、曲声悠扬的温馨氛围。下片就描写家人向寿主祝颂的情景以及寿主王夫人的雍容华贵之态。家中大摆筵席，表演歌舞，斟满美酒，这本身就不是普通人家所能做到的，“兰堂”、“金炉”、“新曲动帘帷”、“琼卮”等都是富贵的符号，其家庭富裕，明若观火。显贵雅士也不是超然物外的人，在这一点上，晏殊也是不例外的。晏殊的这类作品较为真实地保留着当时上流阶层的优裕物质生活空间，以及希望这样的富贵安逸的生活能够持久的心理。

### 3. 远离都市公共空间

#### 1) “小阁重帘有燕过” — 高雅士大夫的富贵生活境界

关于晏殊的“富贵”，宋人笔记有多少记载，吴处厚《青箱杂记》云：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sup>28)</sup>

这段话说明，晏殊的文章带着天然富贵，而更加准确地说，他文章的富贵与其说出于天然，不如说出于其一生富贵显达的生活经历及生活空间与高雅的审美取向结合的结果。这则记载容易使人仿佛晏殊根本不说“金玉锦绣”之类，甚

27) 晏殊先后娶过三位夫人，即李氏、孟氏和王氏，此词的女主人公是王氏，其生日在秋天。[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28) [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册，第219-220页。

而使人误解晏殊不顾物质享受，但正如从上面的词作已确认，其言其实不尽然。对此彭国忠亦云：“这首先是不对，因为富贵毕竟离不开金玉锦绣；其次是不确，不符合晏殊词的创作实际。”<sup>29)</sup> 其言颇为中肯。富贵需要物质前提，虽不限于金玉锦绣，但毕竟也抛不开物质财货。晏殊笔下的富贵，因他亲身持久地享受丰饶的物质生活，已浸透其身心，所以能自然地显露出来。晏殊并没有否定物质财货的价值，但他要求与物质上的财富相称的风度与气象。他认为只大肆炫耀奢侈、追求眼前华丽的，则是卑鄙俗气的“乞儿相”。《梦溪笔谈》记载一个暴发户的故事<sup>30)</sup>：石曼卿的邻家拥有豪华大宅、僮仆家妓数十人，连日享受歌钟不绝的生活，仅从物质上的财力来看，他的富裕是难与为匹的，但其人不过是“钱痴”，不知礼仪，没有文化，盲目求取物质财富。晏殊排斥的就是这种行为态度。一般而言，人处在优裕的环境中，往往过度沉溺于享乐，容易流于庸俗。当时都市的繁荣使得贵族官僚与富商沉溺于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往往向庸俗的方向发展，“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工人炼金为箔，其徒日繁，计所费岁不下十万两，既坏不可复，浸以成风，良可戒也。”<sup>31)</sup> 真宗对辅臣所说的这段话，指出京城士民富裕，

29) 彭国忠：《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30)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饌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昧，殆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通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宋]沈括：《梦溪笔谈》，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74-75页。

31) [宋]李焘撰：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北京：中华

难以保持节约，容易变得奢侈的风潮。人人一味求取物质财富，以为这才是富贵，而晏殊却不以为然。欧阳修《归田录》载：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见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sup>32)</sup>

此语是诗评，而也反映晏殊对富贵的观点，与《青箱杂记》的记录一脉相通。他所认可的富贵，不仅仅是镶金嵌玉，炫耀财富，而是一种高尚文雅的风度自然而然渗透的生活境界。换言之，晏殊认为，在经济条件上增添与士大夫身份相称的高雅审美趣味，这才是真正的富贵。晏殊对文学的要求也是如此，因而在他的词作中表现的都市享乐生活优雅清淡而又不奢侈放纵，试看晏殊的《清平乐》（金风细细）：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这首词用淡雅的笔触来描绘秋景中一位士大夫的一丝伤感，俞陛云评价：“纯写秋来景色，惟结句略含清寂之思，情味于言外求之，宋初之高格也。”<sup>33)</sup>虽无华丽的字句，但仍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富贵都市生活气象。叶嘉莹《大晏词的欣赏》云：“写富贵者，如其《浣溪沙》之‘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踏莎行》之‘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玉楼春》之‘朱帘半下香销印，二月东风催柳信，琵琶旁畔且寻思，鸂鶒前头休借问’，这些词句，皆所谓不言金玉而自有富贵气象者，正如《能改斋漫录》所载晁无咎云：‘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sup>34)</sup>这概括得准确。

书局，2004年版，第1526页。

32)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册，第1928-1929页。

33) 俞陛云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34)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如上所见，晏殊的富贵常以自然景物为陪衬，这当然不是羁旅中能所见的那种，而是在都市的私家园林中人工营造的自然，这种园林风景显然是晏殊之富贵的一个表现。上面的吴处厚《青箱杂记》引晏殊自己的话云：“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从此可推知，这种园林景致是穷儿家没法享有的，晏殊对自家园林颇有自豪感。这种园林本身以物质财华为基础，而它又符合士大夫的雅致趣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富贵，如吴功正《宋代美学史》所云的：“宋代园林文化和美学精神的精髓就在于把物质现象的园林视为精神现象。这样就自然超越了物质层次进入精神层次——文化、审美层次。”<sup>35)</sup> 园林带着的这种特征，消解富贵所可能造成的庸俗，呈现出有别于暴发户的生活境界，这就在晏殊词中以“富贵气象”呈现。关于晏殊的私家园林，二宋集有《和同叔西园》诗多首，又有晏殊的《和王校勘中夏东园》五古、《中园赋》，在此中谈及的西园、东园、中园殆皆是晏殊自家园林的组成部分。<sup>36)</sup> 从宋祁《赋成中丞临川侍郎西园杂题》十首即《双假山》、《烟竹》、《牡丹》、《醅醪架》、《柳》、《射棚》、《李树》、《柏树》、《小池》、《桃》<sup>37)</sup>，可想而知山水花木亭台全备的西园之胜景。晏殊对自家园林的布置予以格外的照料：

元献晏公为丞相时，作新第于城南。时钱思公镇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绝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华馆落成和气动，便随桃花共芳菲。”<sup>38)</sup>

35) 吴功正：《宋代美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36) 夏承焘：《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7页。唐红卫、李光翠、阳海燕：《二晏年谱长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37) 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册，第2611-2612, 2562, 2563, 2570, 2574页。

38) [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1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5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4册，第60页。据《二晏年谱长编》，“丞相或为计相（三司使）之误，晏殊庆历年间为丞相时，钱惟演已卒多年。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可知，本年（1031）正月钱惟演知河南府、留守西京洛阳。故暂系此年。”参见唐红卫、李光翠、阳海燕：《二晏年谱长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始移植西冈第中，特称赏之。一日贵游賂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王君玉闻盗花种事，以诗遗公：“馆娃宫北旧精神，粉瘦琼寒露蕊新。园吏无端偷折去，凤城从此有双身。”自尔名园争培接，遍都城矣。<sup>39)</sup>

由钱惟演的绝句可推知，侍弄园林属于当时士大夫的高雅趣味，他们对园林风景的打造颇有见解。晏殊精心装点园林，其园中的红梅被盗，“名园争培接，遍都城”之事，说明当时的园林文化中晏殊的私家园林所占的影响力。“由于中国园林是主人生活和性格的某种象征，因此园林必定表现和反映主人的日常活动及抽象的思想。”<sup>40)</sup> 晏殊的私家园林就是如此，这空间反映都市的富贵生活，同时反映其士大夫的雅致趣味。

## 2) “东风昨夜回梁苑” — 文人士大夫的雅宴

私家园林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居住空间一部分。至于晏殊的住所，天圣七年（1029）三十九岁时开始营造西园私邸<sup>41)</sup>，这是说明其财富的佐证。北宋元丰以前，京城没有办公和居住合一的住所，如叶梦得所云的：“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sup>42)</sup>，在京官员需要安排自己的住处。居住方式，有赐宅、买房或建房、租赁等，受赐宅第属于特殊情况而享有者稀少，买房或建房需备相应的经济条件，相当部分在京官员在外租房，可知官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sup>43)</sup> 晏殊身居显要之后，借助他的地位和财富，营造

39) [宋]蔡绦撰：《西清诗话》卷下，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19页。

40) [美]查尔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中国园林之意义》，《建筑师》编辑部编：《建筑师》27，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41)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42) [宋]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卷中，[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427页。

43) 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

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取代都市公共空间承担的消费、享乐、休闲、交往等的功能，进而先导符合士大夫趣味的都市文化生活。都市与乡村相比，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因此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聚集之地<sup>44)</sup>，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云：“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集聚，文人士大夫阶层纷纷迁居城市，城市作为由士大夫所主导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更趋加强。”<sup>45)</sup>晏殊作为士大夫之首，在士大夫都市文化形成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晏殊就是政坛和文坛的中心人物，他的地位、财富与名声具有能够召集名流参加雅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中所云的：“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sup>46)</sup>晏殊平时喜爱交游唱和，在政务之余时常主办雅宴，带领着当时的精英文客，领导以私家园林为基地的士大夫都市文化活动。试看其《木兰花》（东风昨夜回梁苑）：

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  
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

杨湜《古今词话》对此词的创作背景所记录的：“庆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献公会两禁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曰：‘东风昨夜回梁苑。……’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sup>47)</sup>据此记载，这场雅宴的主办者是身为丞相的晏殊，地点是他的京城私第，宾客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晏殊本人带头写出此词，坐客相与酬和，这就是此雅宴的主要活动内容。首句的“梁苑”就提供对这场空间的信息：它本是西汉梁孝王招延四方文客宴饮游乐的场所，在此借指晏殊宴请文人士大夫的私第园林。这种

40页。

44) 这种文人士大夫向都市集中的现象至宋代更为普遍，在国都汴京尤甚。参见[韩]梁钟国：《宋代士大夫社会研究》，首尔：三知院，1996年版，第138页。

45)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4页。

46) [宋]欧阳修：《归田录》，[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册，第1922页。

47) [宋]杨湜撰：《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1页。

宅园是有主人的空间，按照主人的需求可以暂时向限定的人员开放，其成员符合主人要求的一定条件，在该空间中进行的的活动亦受制于主人的意思。换言之，主宰空间的主体即是晏殊本人，他的意志直接作用于空间内容。对晏殊而言，如上文所陈述，富于儒家文化修养的官僚士大夫，儒雅的风度贯串其一生，可说是颇为接近“雅”的人物之一，他远离市井气息，追求士大夫的雅致情味。因此，虽这空间作为享乐之所承载着都市世俗生活的一定需求，但总不脱离富贵而不奢侈、放松而不放纵、风流而不下流的境界。通过《古今词话》的记载和词中的描写可以想见，名重一时的士大夫在迎接初春的庭园参与雅宴，徜徉园中、赏花饮酒、填词唱和的场景，这就是士大夫都市娱乐文化活动的风范。晏殊领头进行的雅宴情况，由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记载也可见一斑：

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而盘饌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见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sup>48)</sup>

由此可知，晏殊注重宴饮的风流韵致，设宴并不豪华恣纵。其实，品尝美酒佳肴、欣赏唱歌奏乐，这种娱乐形势在市井中也流行，而为高尚的士大夫所接受，其运用方式有了加工和节制。酒肴稍阑即罢，遣散乐工歌妓，以此控制嗜欲、不容精疲力尽，主宾就用“相与赋诗”的方式来抒发保留下来的余兴。又《破阵子》（燕子欲归时节）云：“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尊傍菊丛。歌长粉面红。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上片描写秋日小会的场景：菊丛里举杯共饮，感赏歌妓的演唱。过片二句表现时间的经过，同时暗示宴会的阑珊，尾二句写酒阑歌残后，士大夫以填词而抒发“言不尽”之情怀的情景。对晏殊的这种宴会形式，宇文所安解释为：“饮酒，听歌，然后离散——在词里表现为

4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上卷，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册，第267页。

自然的分散，在故事里表现为人为的罢遣——留下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在未来的酒宴与歌乐中复归。”<sup>49)</sup>词因常在载歌载舞的酒宴上以美人之口歌唱出来，故词的内容和言语与女性唱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而“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这句话在唱者与作者的领域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女性表演者被罢遣，集会的聚焦点转向纯粹属于男社会化的文体：雅正的诗传统。”<sup>50)</sup>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唱词的女性是晏殊蓄有的家妓，她们只是按主人的命令唱歌的表演者而已，虽她们触发词人的感情，但词中的思想内容仍是纯属于男性士大夫自身的。在此，词不仅是为歌唱的工具，而是成为士大夫抒情的媒介。晏殊的许多词是在宴会场景中即席而成的，形式上主要采用接近近体诗的小令，内容上与当场宴会及享乐生活有关，感情思想上反映着当时士大夫的某种享乐意识。下面是张舜民《画墁录》所载的著名的遗事：

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sup>51)</sup>

通过晏殊的话可知，当时一种曲子词和另一种曲子词并存，这两种曲子词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其中一种是在士大夫圈子里不可容忍的。晏殊指出的词句出自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本词以无所忌讳的口吻叙述了女主人公对抛弃自己而离去的男人之怨恨以及对过去未能挽留他的后悔。虽然晏殊也有写过艳情，但未曾如此直接发出女性的声音，即使假借女性的口吻，其词中表现的思想感情总归是从男性的立场上出来的，与认同实际女性的处境和心

49)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 《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学术月刊》，2008年11期，第32页。

50)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 《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学术月刊》，2008年11期，第32页。

51) [宋]张舜民撰：《画墁录》，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册，第218页。原本作“绿线慵拈伴伊坐”，而据薛瑞生《乐章集校注》改为“针线闲拈伴伊坐”。



情而写词的柳永有大的距离，因此晏几道为其父辩护而言：“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曾作妇人语也。”<sup>52)</sup>从晏氏父子的话可以推知，士大夫填词的态度和作风已有转化：从用歌女之口吻的“妇人语”来写词的方式，到将写词当做自我抒写情志的方式。柳永词中淫靡的艳词不少，而晏殊偏偏选择这一首的理由可能在此。

#### 4. 富贵宰相的都市眷恋

士大夫的丰裕的物质享乐生活离不开繁华的都市环境，他们能否享受这种都市生活，取决于其政治上的成功与否。京都尤其是政治的枢纽，也是权力的中心，接近京都，便意味着参与政治，获得权力；远离京都，则象征着脱离政坛，消减功名。《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乙亥，以内重外轻，命省台、寺监及监司、守令居职及二年者，许更迭出入除擢。”<sup>53)</sup>京官势重而外官势轻，于是官僚不愿出朝外任，更嫌弃偏远地区，“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sup>54)</sup>因此，士大夫因贬职、外放等各种缘故而离开京都后，往往充满失意之情，追忆美好的往事，表现对京都的思念。《能改斋漫录》十六所载的：

晏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自南都移陈，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词。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也！”<sup>55)</sup>

52) [宋]范温撰：《潜溪诗眼》，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0页。

5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7，《本纪》第28，《高宗五》，绍兴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3页。

5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59，《志》第112，《选举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21页。

55) [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5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4册，第194页。

在此故事中，晏殊对被贬出京颇为介怀，锱铢必较千里与五百里，对官奴勃然大怒，可见其沉迷京都的程度。他官位高及宰相，在汴京已尝彻功名的滋味，因此在政治意义上更为留恋汴京。其《临江仙》云：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  
此别要知须强饮，雪残风细长亭。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此词写于晏殊晚年罢相外任之时。在送别旧友的时候，哀叹冷落的身世，怀念都城的往事。“资善堂”是宋代太子就学之处，据夏承焘《二晏年谱》<sup>56)</sup>，真宗天禧二年（1018）八月，晏殊以户部员外郎，充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此时仁宗立为皇太子，晏殊就在资善堂辅弼仁宗。这段经历对他的仕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仁宗即位后，晏殊因是东宫旧人而受宠信重用，此后飞黄腾达，官至宰相。他思念当年“朝夕奉皇明”的鼎盛之时，流露对汴京的缅怀及归京的心念，“待君归觐九重城”不仅是对旧友的祝福，也是对自己的祝愿。他又在《浣溪沙》（绿叶红花媚晓烟）中写道：“可惜异香珠箔外，不辞清唱玉尊前。使星归觐九重天。”此词亦写于晏殊离京外任之时，末句他以“使星”自称，透露了不久后就从外地返京重见君王的期待。晏殊运用“九重城”、“九重天”等词语来点明对帝王或朝廷的向往，他的京都眷恋与功名渴望一脉相生。

至于晏殊的富贵都市生活，他的政治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尚未显达之时，他不富裕，因而这一时期其词里描写的都市生活亦尚未能展现晏殊特有的富贵风貌。<sup>57)</sup> 晏殊的政治地位达到顶点，与高位陪伴的汴京生活随之而来。下面的《玉堂春》（斗城池馆）充分展现晏殊本人的富贵生活空间和对此的满

56)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3-194页。

57) 例如，上面已提到的《迎春乐》（长安紫陌春归早）：“长安紫陌春归早。舞垂杨、染芳草。被啼莺语燕催清晓。正好梦、频惊觉。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可以发现“长安紫陌”、“青楼临大道”等对都市公共空间的描写，这可是晏殊词作中相当难得。全篇抒写了恋妓之情，语义浅白，缺乏雅趣，难称为晏殊典型的富贵风格。

足，刘扬忠曾云：“这一首亮出了作者的宰相身份，公开描写了宰相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有展示了家居宴乐的生活场景。因此，本篇算得上是一次自我化的表现。”<sup>58)</sup>

斗城池馆。二月风和烟暖。绣户珠帘，日影初长。玉辔金鞍、缭绕沙堤路，几处行人映绿杨。小槛朱阑回倚，千花浓露香。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约林间坐夕阳。

此首描写了春日词人在都城赏景宴乐的情景。首句直接点明空间背景，接下来的三句展现迎春的汴京全景。下二句推摄到通往相府的沙堤路上，描写出路上目睹的春日清静之风景。“沙堤”字面上意味着用沙石等筑成的堤岸，而该词语又指唐代专为宰相通行车马所铺筑的沙面大路，晏殊借此暗示其宰相身份<sup>59)</sup>。下片移步到相府的庭园，在与外界分隔的“小槛朱阑”里，欣赏百花香露、管弦悠扬，仿若都市中的小仙境。全篇通过汴京的美丽景致和私邸的悠闲情景，刻画出闲雅的赏春人，这就是一般人绝对接触不到的上层士大夫都市生活空间，从此窥见晏殊对自己都市生活空间的得意和自豪。

如上所见，晏殊词作反映了富贵的都市生活景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安逸和快乐。而与此同时，晏殊虽处于富裕的都市生活环境中，仍带着某种淡淡的忧伤，“在他的不少词中，常常潜伏着一种忧郁和骚动不安的情绪”。<sup>60)</sup>例如，已在上文所引用的《清平乐》（金风细细）词，全篇中没有表露感情的字句，而可以窥见其闲雅富贵生活中蕴藏着的忧伤。再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58) 刘扬忠编著：《晏殊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182页。

59) 据张草纫的推测，这首词可能写于庆历元年（1041）即晏殊出任宰相的次年二月。参见[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60) 杨海明：《唐宋词史》，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以澄淡雅致的笔致描绘的庭院池阁风景，很自然地表现出晏殊的富贵生活情趣，而末句忽然露出散席后的寂寥之感，这是晏殊在都市生活中感到的一种“闲愁”。《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云：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通过这首词可以大概了解晏殊常有闲愁的缘由，如流的年华、有限的生命、无由的离别，这都是令他嗟叹。对待这无情的常理，晏殊采取的无奈之举是“酒筵歌席莫辞频”，“怜取眼前人”，这样的及时行乐之态度。宛敏灏批评晏殊的这类词句而云：“皆无沉挚的情感，实与真正叹光阴易逝、伤聚散无常者有异，盖同叙于富贵得意之余，念百年之易尽，欢愉之难再，偶生愁绪，辄见于词。但究系一瞬的感觉，不能久占心灵，故表现于文学上者亦不充实，不深刻，徒令人读之生厌，故可谓之无病呻吟也。”<sup>61)</sup> 而叶嘉莹反驳宛敏灏的观点而言：“伤感之产生，原不必定要有何人事上的剧变大故，仅自然界的盛衰代序便已足可令人体体会到无常的可悲了，而无常对人类的威胁，则又是不分穷达与贵贱的，因之诗人对无常的威胁所感受的深浅，实在并不在其身世之穷达，而只在其感觉之锐钝。”<sup>62)</sup> 两位学者的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一般的愁心缘于实际遇到的困境，但晏殊的闲愁是他身处高位锦衣玉食时抒发的，可以说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丧失之预感与忧虑，因此从客观上看，它有缺乏迫切之感。但对个人主观感受，亦不能只采用他人的标准，再者，得到的东西越大，失去的痛苦越大，身为富贵宰相的晏殊对失去的恐惧，会比一般人大得多。而且晏殊的人生也不只有坦途，家人的死亡、仕途上的几次风波<sup>63)</sup>，都引发他对人生有限、世无永恒的敏锐感受。

61) 宛敏灏：《二晏及其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6页。

62) 叶嘉莹：《大晏词的欣赏》，《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

63) 参看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2页。

晏殊的这种心理发展到对“现在”的珍惜。已经达到仕途顶峰的晏殊似乎没有不如意的事，而连他也留不住的就是“现在”，行乐的时机也是“现在”。“现在”不止意味着时间概念，也包含着空间，即他身为高官塑造的富贵安乐的都市生活。《清平乐》（春花秋草）云：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总把千山眉黛扫。未抵别愁多少。  
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

“春花秋草”让晏殊感到飞逝的时光，在岁月面前没有一成不变，也没有永恒不变。虽他现在身居高官，但总有一天会丧失其地位，所以珍惜现在能享受的一切。

张仲谋《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一文说：“只有那些既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又不乏伤生忧世之心的词人，才可能撇开现实的纷华喧嚣，把感情的触角伸到心理意识的深处，使人类心灵中常存永在的一份悲哀得以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愁绪是以人生的缺憾为基因，它与现实的联系更为渺茫潜隐，在人性心理结构中属于更深的层次。”<sup>64</sup>这种细腻的感情心理只在富贵悠闲的都市生活中得到体味和感触，晏殊在其词中表露的闲愁就是如此。

## 5. 结语

词人即使同样生活在作为整体的都市，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经济状况、文化品位等的因素共同决定其都市生活空间，不同类型的词人形成不同的生活空间。这种空间的区隔，不单限于地理位置，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和心理结构对应。词人与各自不同的都市生活空间相互作用，基于他们自己的空间经验来书写都市，于是他们的都市写作就有了表现不同都市空间内涵的意义。

一般士人及下层官僚的生活与都市公共空间关系紧密，但上层士大夫的生

64) 张仲谋：《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文学遗产》，1996年06期，第44页。

活空间与他们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生活空间是与这种公共空间隔断的另一种空间，晏殊的生活空间就是如此。他是长时间在汴京做高官的顶层士大夫，其都市书写展现出禁止一般人出入的宫廷官署、贵族宅院等的空间内容。

都市公共空间因新颖别致而吸引注目，但这不是宋代都市空间的全部，晏殊的生活空间可代表上流文化空间。其词中可窥见皇室宗族及世家大族的丰饶豪华的宴会场景，又同时也可确认精英士大夫的都市文化活动。晏殊利用与高位般配的财富，以私第园林为基地享有真正的富贵与高尚的审美取向结合的士大夫都市生活。晏殊在这样的都市生活空间中，表现作为上层士大夫的都市生活及感受、书写上流阶层的空间内容和空间心理，给宋词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正如交响乐团的每一个乐器以不同音色演奏出不同的旋律，协调作出美丽的合奏曲。

## 參考文獻

### 1. 古籍文獻

-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 [宋]李焘撰；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 [宋]范温撰：《潜溪诗眼》，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 [宋]晏殊著；[宋]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宋]杨湜撰：《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 [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5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 [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篇，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 [宋]张舜民撰：《画墁录》，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 [宋]蔡绦撰：《西清诗话》，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 [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 [宋]叶梦得撰：《石林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2. 专著

-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 唐红卫、李光翠、阳海燕：《二晏年谱长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梁丽芳：《柳永及其词之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 刘扬忠编著：《晏殊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版。
-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杨海明：《唐宋词史》，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吴功正：《宋代美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宛敏灏：《二晏及其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 俞陛云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 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 彭国忠：《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 夏承焘：《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韩]梁钟国：《宋代士大夫社会研究》，首尔：三知院，1996年版。
- [日]宇野直人 (Uno Naoto) 著；张海鸥、羊昭红译：《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



### 3. 论文

- 刘尊明：《宋代的祝寿风气与寿词创作》，《文史知识》，1998年03期。
- 姚行地：《关于宋代“馆职”》，《图书情报工作》，1988年06期。
- 张仲谋：《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文学遗产》，1996年06期。
- 朱红梅：《唐宋童子科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 曾大兴：《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 陈登平：《柳永都市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 叶嘉莹：《大晏词的欣赏》，《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韩]李真雅：《北宋下层文人的都市生活空间与其歌词书写——以柳永为个案》，《中国语文论译丛刊》48辑，2021年。
- [美]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中国园林之意义》，《建筑师》编辑部编：《建筑师》27，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
- [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学术月刊》，2008年11期。

## Abstract

The Scholar-official's Urban Living Space and Their Lyr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Focusing on Yan Shu

Lee, Jin-ah

Ci and the city alway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ntermediation of Ci poets. Ci poets are the subject of Ci creation, also are the subject of urban space. City, as the living space of Ci poets, affects contents and life feelings of their life, participates in individual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s into an organic part of the work space. Even if the Ci poets live in the city as a whole,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determine their living space, thus different status of the Ci poets form different types of living space. Ci poets write the city based on their own spatial experience, so their urban writing has the meaning of expressing different urban spatial connotations. This study argues the bia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 and cities on the factors of “downtown” and “townspeople”,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urban living spac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Taking Yan Shu as a cas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upper scholar-officials lived and felt in certain urban space, and what kind of lyrics they created, in order to obtain various angles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yrics and cities.

**Key words** : Cit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Urban Space, Urban Ci, Ci of the Scholar-official, Ci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shu

투 고 일 : 2021. 4. 10. / 심 사 일 : 2021. 4. 15.~ 2021.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1. 5. 20.